

2/102

8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重庆盐业见闻	马绍周 (1)
重庆布匹商业的早期概况	
.....卓德全 王仲鼎 周让伯 (27)	
帝国主义垄断下的重庆山货业	
.....杨灿雪 杨质彬 夏荫枬 李若愚 (50)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侵略	
.....应社多 彭燧良 (83)	
宝光银楼和“宝光”金条	江朝荣 (95)
重庆中南橡胶厂创办经过	陈维新 (109)
赵春咏和重庆永新化学公司	宫商闻 (137)
重庆惠工铁工厂的回顾	李济苍 (163)

重 庆 盐 业 见 闻

马 绍 周

盐是四川最著名的天然富源。抗日战争以前，其年产量常达六百余万担（每担一百市斤），居全国第三位或第四位，因之征收盐税也就成为四川历史上最大的财源，始终是全省财政收入中的第一位。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军阀你争我夺，战事频仍，可以说大多与抢夺盐税有关。

过去四川一共有二十八个盐场，其中以富荣盐场（即富顺的自流井与荣县的贡井，今属自贡市）为最大，历年均占全川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盐场行销各地的引盐（注），是以重庆为转运枢纽，四川盐运使署和多数经营盐业的总号，也都设立于此，而重庆的盐业遂与钱业、匹头、棉纱并列，且居其首，号称四大商帮。

我于一九一六年十六岁时，即入文盛永盐号当学徒，以后逐步由先生而经理，所经营的盐号计有万顺荣、旭东升、利川公、庆和、渠河运商公记等，此外还曾在其他许多盐号搭股，直到一九三〇年进入重庆盐业银行后，才开始逐步结束业务，但基本脱离运商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在盐业的二十多年间，对于军阀、盐官对盐商的压榨掠夺，盐商对军阀、盐官的巴结，以及

〔注〕在盐务行政中，销盐的区域叫岸。富荣盐场的岸，除了由陆路运销的附近十三个市、县外，其在云南、贵州两省的销区叫边岸（取其销地窈远之意），在省内自前清雍正时起实行计口授食办法的销区叫计岸，在湖北、湖南两省的销区叫济楚岸（太平天国革命时，淮盐不能上运，改以川盐接济，故名；以后这两省的销区仍由川盐供应，名称亦相沿承袭下来）。因为这三个岸都是由水道运往，运盐的执照都叫做引，所以又统称之为引岸，运销的盐就称为引盐。至于经由陆路运销的盐则称为票盐。

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种种乌烟瘴气黑暗丑恶的情况，耳闻目睹颇为不少，其中有些人事情节，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仅将我在盐业早期的一些见闻，择要作一片断的记述。

一、关于盐税和各项附加

过去的盐税，本来是反动政权的收入。但自一九一八年熊克武被广东政府委任为四川督军后，就和当时的盐务稽核所经理张英华签订协议，停止向北洋政府解款，所收盐税除供给四川盐运使署和盐务稽核所两个机构所需的经费外，余数全部拨充军用，从此四川盐税就完全为军阀所截留。

富荣盐场的盐税，平均每年总在一千万元上下，故特别为掠夺成性的各军阀所垂涎。一九二五年的军阀混战——杨森“统一之战”，就是以公开争夺富荣盐场的盐税揭开战幕的。这些军阀把地盘争夺到手以后，为了更多地榨取盐税收入，就为所欲为地屡次变更盐的运销办法，重庆运商的消长变化亦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兴败无常，命运莫测，回忆起来真有历尽沧桑之感。

关于盐税，在军阀截留以前，征收方式同其他行业并无二致，还是运商在买盐时才上税，买多少盐就上多少税。但自军阀截留盐税以后，就一变而为通过商会实行派垫，预提盐税；不管运商是否需要买盐，以及其需要量如何，都得无条件承担军阀的派垫。然而军阀是贪得无厌的，所以派垫也就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税溢于盐”（即供过于求，因完税后应购的盐超过了实际需要量）的现象，便逐渐严重起来了。

到了一九二一年刘湘就任川军总司令后，又以“以简驭繁”为名，将每月派垫的税款，强迫由运商自己的组织——盐帮公所承担，公所把税款垫缴以后，再将税单分派给各盐号。这样一来，凡是盐商，不管你当时的需要如何，都得无条件地承担税务。于是，有心染指盐业的，视垫税为畏途，不敢问津；少数实

力雄厚，能够缴税的就恃税而专，垄断业务；多数资金薄弱的盐号，无力继续经营，只好甘受淘汰，全业遂由六十多家渐次减少为三十多家。而此时的盐帮公所，由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军阀包税，便完全为少数大盐号所操纵把持。

在军阀、盐官串通一气，朋比为奸之下，其后的派垫办法虽又经过种种的更改，从每月无定额到有定额，从军阀的各自为政到成立联合机构实行统收统支，从原来的集团包销到另招新商（即所谓“多数认商”），看起来尽管五花八门，但变来变去，仍不过是千方百计压榨剥削，以满足其私欲和野心而已。当时，在他们的专制淫威下，盐业也就成为所谓“盐无百日安”的动荡、瘫痪局面，而必须买盐度日的广大人民则深受其苦。

军阀、盐官对盐商的敲诈勒索，具体情况留待下节专门叙述。这里谈谈他们除开征收正税以外的那些多如牛毛的盐税附加。

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形成后，各地军阀都在自己的防区内称王称霸，遍设关卡，随意征收捐税，盐载的附加更是特别严重。当时，盐船一靠岸，盐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东奔西跑忙着上税。按盐包贴印花税是不要说的了，这是沿江每县都要征收一次的；此外还有因地制宜的什么到岸费、过境税、马路捐，以至某某同学会的会捐等等，真是名目繁多，难于尽述。最初，这些苛捐杂税，每载尚不过数十元至一、二百元，以后花样越来越多，征额越来越大，复从七、八百元直到超过正税的税额。

在此期间，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不已，所耗战费之巨简直无从估计，百业凋条，生灵涂炭，早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但是战胜者愈加耀武扬威，野心勃勃，积极扩张实力，企图称霸全川；战败者虽退守他地，但仍不甘落后，总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因此，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在加紧搜刮勒索，横征暴敛，民间疾苦，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况下，盐载的附加在一九三〇年底以后，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仅以渠河一岸为例。当时食盐一载（九万三千六百斤）在富荣盐场尚未出关时，即由自流井马路局收马路捐、学捐共四十五元，川南警备部收公安捐二十元；盐到泸县，市政公所收市政经费六元、印花税二元，码头征收处收码头捐二元四角；盐到合江，二十四军收印花税四元；盐到江津，二十四军收印花税三元，学友互助社支社经费十元；盐到重庆，渝简马路局收马路捐十五元，二十一军印花税总局收三卡印花税花盐九角、巴盐一元二角，二十八军设在重庆的渠河食盐平价处收渠盐平价费八百元，渠盐新印花税十六元；盐到澄江口，峡防局收北碚团费一百三十元，印花税九角，查验费九角，军费印花税十元；盐到璧山夏溪口，二十八军收护商清乡费三十五元；盐到草街子，二十八军收护商费六十五元五角；盐到合川，二十八军收江防护商费一百六十元，合川市政经费四元五角；盐到小米溪，二十八军收护商费四十五元；盐到广安，军阀罗泽洲（刘湘旁系，新编二十三师师长）收护商费三百七十八元；盐到渠县澣渡河，二十军收护商费二百二十元零五角；盐到渠县三汇镇，二十军收护商费九十元；盐到达县，川陕边防军收护商费九十元，新加进口税三百六十元，第二次新加进口税九十元。

必须说明，从富荣盐场到达县沿途所征收的附加，上面举出的只是我记忆所及的，肯定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附加被遗漏了。但是就以上面这些作一粗略的统计，附加总数即达二千六百元以上，已经超过了正税（此时计岸盐每载的正税为二千二百五十元）。这两者相加起来，就数倍于进货成本。

至于其他各岸（重庆运商的经营范围共有八个岸，即一个楚岸，三个计岸——泸南、涪万、渠河，四个边岸——仁边、綦边、涪边、永边），情况也都大同小异，而且有的岸的附加，比渠河岸还要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除此而外，各岸运商在行盐途中，还会经常遭到一些哭笑不

得的勒索。单是在一九三〇年，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①川南警备部改团练为公安队，所需经费完全从食盐抽收，盐商认为不合情理，联名请求收回成命，川南警备部竟派兵将盐载扣留，不予放行；结果还是盐商出钱，达成协议；事后公安队电盐运使署说：“以前阻放盐载，亦不过欲促此项经费早有着落而已”。②前二十军军阀郭汝栋驻防綦江时，綦边岸盐载每载附加四百五十元，后来郭部出川，驻地由二十一军接防，因二十一军已统一征收盐税附加（即整理费），綦岸附加理应取消，但刘湘却以郭部在綦负债应该偿还为口实，强行继续征收，以后就相沿成例，始终没有停止。③其时北伐早已结束，但济楚的盐载在宜昌仍由征榷局每担征收三元的“北伐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二、军阀、盐官的敲榨勒索

过去管理盐的机构，一个是专管行政的盐运使署，另一个是专管税收的盐务稽核所。这两个机构在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合并为盐务管理局。从一九二一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时起，盐运使即由军阀委任，至于场岸、缉私、关卡等方面的大大小的盐官，也由各地军阀任免；这些盐官，不是军阀的心腹，就是军阀的“功臣”，或者是同军阀有裙带关系的。军阀之所以委任他们，主要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稽核所的主管人员，则由北洋政府、其后由南京政府直接委派。这两方面的人虽然来历不同，但走马上任之后，自然同流合污，各有一套坐以致富的办法。总之，军阀是明目张胆地强迫勒索，盐官则是花样翻新的贪污舞弊，当时的社会，真是暗无天日。

如果要在这一来尽情揭露军阀、盐官的剥削伎俩，确实纸短话长，罪不胜数。我在下面所谈的，只不过千百件中的几件而已。

黔军袁祖铭掠夺盐税一百万元

一九二四年初，杨森企图独霸全川，在将刘成勋、刘斌、陈洪范等部分别击败后，又在川东战败赖心辉及黔军王天培各部，大有直捣重庆之势。时袁祖铭和刘湘正合驻重庆。袁见形势危急，决定逃跑。他在即将退出重庆时胁迫重庆稽核处洋稽核员季履义签发税单一百万元，派铜元局局长杨德淳带兵前往总商会估勒垫付，并扬言是否安全退出就看此款能否收到为定。商会为了维持市面和商户的安宁，同时又考虑到黔军还有去而复回的可能，不能不留一点情面，只好将此一百万元的税单分派给各商帮和富绅。

在商会的分派中，虽然运商只担负了相当一部分，可是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其余各商帮和富绅都纷纷将所持的税单以较大的折扣卖给运商，因此全部税单很快仍落入运商手中。其时运商的如意算盘是：税单既有洋人亲笔签名，当不致发生意外，而且又是折扣买回，日后照税配盐等于先已有了赚项，并还可以得到先捆、先运、先售的好处。

袁祖铭退出重庆以后，市面恢复正常，运商纷纷将税单寄到自流井川南稽核分所配盐，可是只配了几载盐即行停止。这时的季履义，便矢口否认他的签字有效，说他的签字只不过是“在税单上随便划了一个“屁眼”（即○，这是他亲口说出的，他会说不少四川的下流话），这是迫于军事压力临时采取的应付办法，根本不作数。

这一来，运商个个大惊失色，到处呼冤叫屈。季履义的亲笔签名尽管终于抵赖不了，但川南稽核分所却又以此项税单曾发生买卖折扣行为，坚决不予配盐。运商屡次向北洋政府申诉实情，均未获理睬；拖到一九二七年，北京盐务署竟认为这是商人和军事当局发生的纠葛，应由双方直接磋商解决，悍然驳回一切申诉。

此时，刘湘自己的军饷开支也相当支绌，自顾尚且不暇，也就置若罔闻。至此，一百万元的盐税几乎全部白白相送，运商的幻想也终于成为泡影。这是重庆运商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

盐运使梁正麟的贪污伎俩

梁正麟在民国初年曾任川南道尹，一九一五年又曾协助四川第一任盐运使晏安澜组织运盐公司（由各岸盐号合资组织的专卖公司），在盐业的所谓“川淮之争”（一九一八年）时，他又被推为四川盐商赴京代表，为四川盐商争权益。后来他任第三军边防军赖心辉的秘书长。一九二五年刘湘与赖心辉合作，北京政府委赖为省长，刘湘以川康边防督办名义保梁为四川盐运使。时刘湘正在积极组织对抗杨森“统一之战”的倒杨联军，梁从中擘划甚多，并屡向刘湘献条陈控制盐税，因而颇受刘湘的器重。

梁正麟对盐务本甚熟悉，现在又有了强大的靠山，自然就有恃无恐地大肆进行贪污舞弊。小的、个别的不谈，这里单说两件大的、有持续性的。

一件是利用职权，无本经营。他自知官居高位，不便出面与盐商公开争利，于是就乘一部分盐商控诉天锡生、福兴玉、同亿义、大昌祥等四大楚商垄断居奇的机会，一面向这四家楚商提出警告，要他们让出四成载额，不然“箍箍要爆”；一面暗中支持盐运使署科长吴受彤的亲戚邓蟾秋插手经营楚盐。经过梁大施手腕后，四大楚商被迫让步，同意让出四成载额（二百载），于是他就立刻批准了经营楚盐的十家新商，其中就有梁的二哥梁仲子化名参加的一家，实际就是他本人的匿名盐号。

这十家新商，联合组成利川公盐号，统筹经营楚盐载额，议定每家各出股本两万元。但梁的盐号却始终分文未出，这其余九家觉得自己得以经营楚盐，完全是靠他的携带，将来更需要盐运使的照顾，他出不出股本实在不算一回事；于是梁正麟就成了利

川公盐号的无本股东，赚钱就分，蚀本不管。我记得在宁汉分裂那一年，他就分得了好几万元的红利。

另一件是：借楚盐改为轮运，大肆勒索。本来梁正麟的前任周骏就已将部分济楚岸食盐改为轮运，而全部改为轮运则在梁接任以后。梁自认为此事“劳苦功高，莫与伦比”，遂暗示楚岸运商要对他报答。楚盐全部改为轮运成功后，盈利确较前大大增加，现在梁既有要钱的表示，运商敢不从命，旋即由盐邦公所召集楚商研究，决定每载盐抽取二百元作为送盐运使的谢礼。在梁正麟看来，这个办法是出自楚商的自愿，这些楚商又都受过他力办轮运的恩惠，这一笔钱虽属不义之财，但却是“取不伤廉”，大可心安理得；对楚商来说，送这一笔钱不过是慷他人（人民）之慨，自己并无损失，而且把两百元的负担均摊在九万九千斤一载的楚盐上，也实在微乎其微，买盐的人不易察觉出来，又何乐而不为。

梁正麟担任盐运使不过一年出头，但他用诸如此类的手法，却囊括了数十万元而去。

师长兼盐运使王缙绪的恶毒计谋

王缙绪原系杨森的部下。“统一之战”时由刘湘许以盐运使的条件而叛杨投刘，至一九三〇年王遂破例以第二师长兼任盐运使。

王上台不久，便指使其军需处长郭松年向聚丰长盐号经理张琴舫提出向运商暂借期票十余万元，以济军饷。张随即转告该号副经理黄凤三（盐邦代表人物之一），黄复转知各盐号。大家以王缙绪兵权在握，而且刚刚上台，不敢得罪，只好答应照借。

殊知王缙绪想吞吃这笔借款。在运商出了期票的次日，王就带着期票面见刘湘，反咬运商向他行贿。刘湘闻言大怒，立命甘典夔严查，声称“我要办人”。甘和运商平日有些勾结，间或还在刘面前代运商陈述困难，这一来也觉得自己的面子不好过，便

质问盐邦公所的值年人曾俊臣：“你们搞的啥名堂？你们有好多脑壳？要不要命，怕不怕死？”经曾将经过原委一一向甘说明，并将公所议案交甘看后，甘才息怒回报刘湘。自此以后，此事未见再提，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期票到期后，虽经几次转期，王仍分文不还。于是运商便掉过头来一致埋怨黄凤三，黄只好去找张琴舫，张又去问郭松年，郭则“王顾左右而言他”，看来毫无着落。这时黄凤三急得来终日绕室嚎啕，自认无颜见同业，决意一死，并将绝命书写就，号上和家中的一切大小事务都拜托张代理。郭松年睹此情状，深恐真的闹出人命案来，事态扩大，遂找盐运使署科长吴受彤等商量解决办法。吴等认为王一向吃鱼避腥，自命清高，此事过硬不得，乃劝盐帮以此款捐赠公益事业。当时盐帮也感到若再争执下去，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以后更难相处，结果决定把这笔钱捐赠王所创办的巴蜀小学，实际上就是任王把这笔借款全部吞没。

王缙绪贪污最大的，是如下的一件事。自王上台后楚岸销路已经不好，原来每载楚盐所抽的二百元早已停止。他的心腹吴受彤就别出心裁，对所有盐载按载抽取“三科经费”八十元，全部归王独享。即此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元左右。王在任五年，总计当在一百万元以上。当时运商一谈起这位王盐运使，无不恨之入骨。

稽核所经理李植榆没收税单的真相

在一九二八年时，由于军阀不断加提税款，税单积存，而捆盐期限又只三月，过期作废，引起运商的强烈反对。当时各军及盐运使署为了顾全自身利益，不使提税受到影响，就请川南稽核分所展缓税单上的捆盐期限，但该所经理李植榆坚不承认，先后没收了过期税单达三十余万元。

运商感到损失太大，倘若以后积税愈来愈多，情况的严重更

不堪设想，便向财政部和盐务署提出控告。部、署同意展期一年，并令川南稽核分所将没收的税单全部退还。然而李植榆却借口未奉稽核总所命令，相应不理。此时军阀照样估提，稽核分所继续没收过期税单，大小运商又无力配盐，个个都一筹莫展。利川公盐号总经理邓蟾秋睹此危急情况，喟然叹道：“羊子不吃寄生子，死了也不闭眼睛的”。意思就是，不花钱是决不能了事的。公所值年人曾俊臣也感到李植榆对任何方面都不买帐，一定另有原因，邓蟾秋的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于是就去找同他伙做鸦片生意的重庆稽核处的科长赵绍农，商议给李送包袱。果然，经过赵穿针引线后，乘李来重庆时，大家就为他举行公宴，极力向他要好。

正在筹划进一步的行动时，又探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李的知己同学；曾、赵密商后决定送李十万元，由曾暗中向盐号筹集，并以他的私人名义汇到上海银行交陈光甫转给李，而且保证坚守秘密。

“钱能通神”，在旧社会这句话一点不错。李植榆自接受贿赂后，以前所坚持的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答谢运商对他的“厚遇”，他还主动代运商设法，另外拟定一个办法，要两军将已提取的税单全部收回，重新给以“印收”，上面注明（可由运商自行决定）配盐的期限。稽核分所以前没收的税单也如数退还。这样，运商虽然损失了十万元，但却得到了极为理想的配盐期限，冻结了的业务又复苏起来。

不久以后，李植榆即因贪污被控撤职下台。他靠着贪污来的这十万元，到上海去又当上了上海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

运商在行盐途中遭受残酷掠夺的事例

上述各节，只是军阀、盐官在重庆一地对运商巧取豪夺的几个片断。下面根据我的记忆，简叙几种运商在行盐途中受外地军

阀残酷掠夺的事例。

一九一七年，重庆巨商王雨膏的万懋正盐号认销涪边岸，其停泊在龚滩河的盐载，被黔军李善波部抢劫一空，损失达二十余万元。万懋正从此资金枯竭，负债累累。王雨膏多方筹划，力图挽回颓势，终因债主盈门，走投无路，忿而吞金自杀。这是为地方军阀的凶残暴虐而弄得家破人亡的重庆第一家大盐号。一九二〇年，天锡生、万顺荣等盐号的盐船行抵涪陵时，被吕超部强行截留，将盐提卖作军饷，各家损失共四万余元。一九二一年，赖心辉任川军总指挥时强迫楚岸运商垫缴军饷十五万元，后来仅以六万余元拨作税款，其余八万余元无下落。是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又派提款委员向运商估提九万余元，许以盐税拨还。事后盐运使署函请赖于盐税内陆续拨还未了清的垫款，赖却借口军事方殷，故意拖延；不久，赖败退，刘解职，这十余万元的垫款从此就石沉大海了。一九二三年杨森退驻宜昌时，估逼运商借款六万余元，后杨森回川，借款各号请求盐运使署代追是项借款，该署自知事情棘手，遂令各商直接向杨交涉；此时杨森气焰正烈，谁敢出面索债，只好奉送。一九二八年杨森驻防万县时，强迫永丰轮载运的楚盐每载纳税一千元。经盐帮邀请杨的代表周稻荪同我去求杨减少，仅同意作为记账放行盐船，但纳税金额不能减少。后来，我们又以两千元为酬，请周见三（杨森的同学）向杨疏通，才以每载改为八百元谈妥，杨并嘱周转饬盐帮一次缴纳二十载的税款一万六千元。诸如此类的事例一时是说不完的。

总之，军阀、盐官对运商的压榨掠夺，从来就没有餍足之时，一有机会决不放过，就是没有机会，也要制造种种借口，从盐商身上压榨出他们所想要的油水。

三、运商巴结逢迎的丑态和采取的主要对策

尽管军阀、盐官对运商极尽勒索之能事，但运商为了追求利

润，也是什么事都作得出来的。事实上，在各商帮中，盐帮始终是四大帮之首，不仅经济力量雄厚，而且同各种地方势力都有紧密的勾结，所以才能够互为利用，狼狈为奸，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把种种剥削全部转嫁给广大的人民，而使自己发财致富，过着骄奢淫佚的豪华阔绰生活。

谈到运商对军阀、盐官的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回忆起来真是丑不堪言，令人作呕，使我深深感到资产阶级本质的丑恶。下面只是几个片断。

“以邪扶正”

一九二六年，奚致和将接任二十一军财务处长时，他的好友华丰盐号经理陈绍尧，事先就传出了消息。因为二十一军财务处是运商的“正管”，新官上任，自然更要加倍奉承。

于是，在探知他常和二十一军医务处长贾文秦等喜好寻花问柳的情形后，运商就把他经常去的“堂子”全部包下来，在那里举行欢迎会。公余之暇，也经常在“堂子”里款待他。这一来，奚致和真是得其所哉，深感运商对他的隆情盛意，体贴入微，而运商的一切大事小事，也都可以在“堂子”里就地解决，方便无比。

同年，陈国栋接任盐运使，他的好友姜仲光也如法炮制，先来通风报信。盐运使同样是运商的“正管”，自然要殷勤迎接，不敢怠慢。陈有听大鼓书和打扑克牌的嗜好，运商就连忙重新油漆盐帮公所的戏台，大唱其戏，饮酒作乐，以示欢迎；以后又经常把一个名叫赵大玉的大鼓书班子请来为他演唱。过去公所一向禁忌女人上台的万年台，也从此破例，不再忌讳。陈赌兴来时，就在公所内辟室设赌，由盐帮头面人物奉陪，当输大输，当赢不赢，使陈越赌越有精神。这位盐运使见运商对他如此奉承，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流连忘返，后来干脆就在公所里批阅公文。于是官商之间融洽无间。运商对陈国栋仍按每载楚盐抽取二百元送

给他；陈国栋对运商，在宁汉分裂急需楚盐济缺时，一再变通准将大量计岸配盐改为楚盐，以致双方各发横财，皆大欢喜。这就是当时运商津津乐道的“以邪扶正”。

顺便在这里说一说，陈国栋任盐运使不到两年，便已腰缠百万。卸任后就在成都和他的原籍郫县广置房屋田产，绸五老七贤。后来，我同石竹轩到成都在他家中作客，酒饭以后，他笑问我们，对他这幢新落成的玻璃洋房闻出有什么气味没有，我们不解其意，于是他洋洋得意地说：“是一股卤气嘛。”真是无耻之尤。

邀 功 争 宠

富荣盐场原属二十四军防区，重庆原属二十一军防区。在盐税分配上，先是两军轮流派员担任提税工作，后来协议成立了二十一、二十四两军财务统筹处，专门办理盐税分赃。

在两军轮流提税时，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盐场厂商依靠二十四军，重庆运商依靠二十一军，同时双方又都在想方设法把对方的后台拉过来，因而厂运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经年累月争执不休，人们戏呼之为“双抱案”。

一九二八年，两军财务统筹处行将成立，二十四军财务处长张富安派宁芷村先来重庆联系摸底，筹备成立统筹处。对重庆运商来说，这正是瓦解厂商后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极力和宁芷村接近，大献殷勤。宁随身带有在自流井预提盐税的税单五十余万元，很想重庆兑现，运商感到统筹处一成立，自然又是一个“正管”，与其雨后送伞，不如雪里送炭，便把税单全部接受下来，很快就使宁如愿以偿。宁见运商竟能这样慷慨解囊，实在喜出望外，一再表示过去他们是“偏听则暗”，而今才是“兼听则明”了。

是年春，统筹处成立，张富安来渝就任处长，运商全体头面人物都到郊外礼园（今鹅岭公园）附近列队恭迎，对张的生活行

止，关注备至。如象张初来住在二十四军的裕通银行，运商见其会客室陈设简陋，便立即为他添置各种豪华设备，如金钱豹皮的椅垫等等，而且朝夕伺候，不离左右。由于预提五十余万元的盐税能够立即兑现，使张对运商早已有了好感，今又见运商是如此地俯首贴耳，奉命唯谨，当然更加另眼看待。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来就怕张富安受运商包围，因而随同前来的厂商代表李敬才、胡铁华等，不久以后就渐渐遭到他的疏远。

运商见计已售，新处长已经成为自己这一边的人，就不时运用种种手腕，排斥厂商，舞弊经营，攫取非分利益。其中要以当众表演的一个类似“苦肉计”的戏剧性场面，得的实惠最大。

是年秋天，运商由于积税甚多，无力配盐，非另外设法不可。于是就邀请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和两军财务统筹处以及盐运使署、重庆稽核处、总商会等单位，在盐帮公所开会。先由曾俊臣陈述盐帮疾苦，以积税过多，目前只有毁掉一部分税单，跟即当场提刀切毁四十载盐的税单（约值十多万元），大有痛不欲生的样子。在运商看来，这四十载盐的税单切毁后如果无人过问，自然是一项大损失，但就是税单在手，目前也无力配盐，还是等于废而无用。另方面从张富安和运商的关系来看，决不致对此不闻不问，相信总有些补偿办法。果如所料，当曾俊臣出人意料地切毁税单之后，在坐者莫不相顾失色，流露出同情之意，张富安也颇为动容，对运商表示怜恤，遂决定以后按载抽收所谓“毁税费”三百元，以资弥补。从此以后，“毁税费”就象军阀征收的附加一样，由盐帮公所一直抽收下去。用四十载盐的税单换取这个长期抽收“毁税费”的特权，运商不特没有受损，反而从广大的食盐人民身上大大捞了一笔（因为“毁税费”是摊在盐价上的），如果不是通过“邀功争宠”把张富安拉了过来，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办到的。